



新广播·新媒体·新视野

# 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Radio Reporting

---

◎ 王 宇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广播·新媒体·新视野

# 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

##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Radio Reporting

---

◎ 王 宇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王宇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

(新广播·新媒体·新视野丛书)

ISBN 978-7-5657-0641-7

I. ①广… II. ①王… III. ①突发事件—广播—新闻报道—研究—中国  
IV. ①G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7499 号

## 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

---

著 者 王 宇

责任编辑 赵丽华

责任印制 张 翊

封面制作 钟雪亮

出版人 蔡 翔

---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978-7-5657-0641-7/G · 0641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 引 言

## 一、研究背景

从汶川地震报道到玉树地震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响应和报道取得了明显进步。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开放的危机管理带来的媒体报道环境变革，另一方面则在于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理念的转变和应急机制、体系等的变革。

有学者将 2008 年初的冰雪灾害报道看作国家应急传播体制的构建发轫。2008 年 1 月 18 日，我国南方出现大暴雪，次日灾情初显。20 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新闻直播间》原定节目取消，改为全面关注雪灾的内容，调动一切资源采访连线，包括现场的司机，发动全国听众帮助被困的人们。1 月 21 日 7 时，该频率打破既定节目编排，临时推出 48 小时不间断特别直播《爱心守望风雪同行》，全力关注各地因雪灾长时间滞留在公路上的司乘人员和受灾群众，并联系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实施救援。此后，随着灾情的发展，该节目不断延长，一直持续到 2 月 12 日，在全国所有媒体同类报道中最为迅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48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 8 级地震，影响我国多个省市，除黑龙江、吉林、新疆外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地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报道内容包括灾情、死亡人数、地震局权威信息发布、政府采取的救援措施、专家解读、各方反应以及地震发生时的应对办法等。其中，广播媒体再一次凸显了广播在灾害性事件传播中无可替代的角色。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主持人孙静在地震发生后仅 27 分钟,就坐在直播室开始播音,该台随后开始播出直播节目《我们在一起》;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在地震发生后一小时紧急推出全天 24 小时滚动直播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中国之声”于当晚 19 时推出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抗震救灾进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陆路、水路、空中三路记者跟随救援部队到达映秀,成为最早报道映秀灾情的媒体,及时地把灾情告诉了受众,也为政府组织救援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信息。在茂县被围困的五天五夜里,广大灾民也是通过仅有的收音机收听广播信息,了解国家救援的情况,“每台收音机的周围都会围满七八十名群众聚精会神地收听”<sup>①</sup>,广播成为信息孤岛上照亮万人的生命之光。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次突发事件报道中,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打破原有节目安排,通过 24 小时不间断直播和大量的现场连线报道,开放式、互动性地进行抗灾救灾的报道,广播媒体即时传播信息、主动引导舆论,对受灾群众进行情感慰藉,进而发挥媒体的社会动员组织功能,配合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抗灾救灾工作,一度成为突发事件的信息平台和应急指挥中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李长春同志在接见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一线记者时所说的那样“在重大灾情的情况下,广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不管各种多媒体怎么发展,广播的作用是别的新闻媒体不可替代的”。

在看到广播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后,社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将中央广播纳入国家应急体系,在当年“两会”上,民革中央提出的议案后来得到有关部门批复认可。2010 年 12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与中央台特别节目《重返灾区——中国之声温暖行动》时指出,广播在抗击自然灾害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尽快建立应急广播体系,它应该是整个国家应急机制的一部分。广播应急体系同其他应急系统结合起来,可以把信息很快传到灾区群众,可以指挥救灾工作,速度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②</sup>。

2011 年 10 月,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

① 《信息生命线》,《中国数字电视》2008 年第 5 期,第 4—5 页。

② [http://www.cnr.cn/zgzb/wjbkc/ssbb/201012/t20101226\\_507502285.html](http://www.cnr.cn/zgzb/wjbkc/ssbb/201012/t20101226_507502285.html)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建立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实现应急广播的全国覆盖和稳定运行。

目前,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已列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

从国际范围看,广播媒介在重大突发事件管理中的优势地位自广播媒介产生之日起就已得到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大突发事件管理是广播媒介出生的摇篮。“泰坦尼克”沉船事件直接刺激了第一台收音机与广播事业的诞生。<sup>①</sup>

相对于纸质媒体、网络和电视等媒介,广播信号覆盖面广,接收过程简便。即使在荒漠之中,也可接收到发射功率较强的无线广播信号,而且接收设备耗电量极低。民众用电池便能维持收音器材的正常运转,也可以手摇发电等方式获得所需电能。民众可以在接收广播信息的同时参与其他活动,相互之间互不干涉。广播这一高存活性与高伴随性媒介在灾难救助等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管理过程中屡显其功。

在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广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政府与民众的广泛认可。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收音机年销售量高达400万台,当年日本的收音机总数猛增至1.6亿台,而日本的全国人口是1.2亿。<sup>②</sup>在日本的商店中,带有手摇发电装置、手电筒等救急装置的收音机非常普遍。

无独有偶,英国居民应付紧急事故,储备的一项必备物品就是一台用电池的收音机以及备用电池。英国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中的行为指导》明确地提出:在紧急事故发生时,“进入屋内,留在屋内,收听广播(当然地震时另当别论)”。

美国为了避免民众因核弹攻击而受害,建构了紧急广播系统,希望以广播与电视网络来传递紧急讯息。“9·11”恐怖袭击与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灾难之后,美国的紧急广播系统透过更多外围与通讯网路,希望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紧急讯息的布达。

---

<sup>①</sup> 端木亿万:《美国传媒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6页。

<sup>②</sup> 中村宏:《对21世纪广播的思考》,<http://www.gznet.edu.cn/gdernet/rgd/festival/cch.html>



## 二、文献综述

西方危机报道研究基于风险社会和危机管理研究之上。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84年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后,人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探讨“风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人类可能的应对状态和方法。对作为潜在灾害和危机的“风险”本身的研究,以及如何利用大众传媒降低风险,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传媒学家研究的前沿课题。劳伦斯·巴顿(Laurence Barton)的《组织危机管理》、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的《危机管理》、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的《危机管理: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及威廉·L·沃(William L. Waugh)的《应对危机四伏的生活》等成为相关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继贝克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及风险社会进行了揭示和探讨: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从风险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考察风险社会;沃特·阿赫特贝格(Wouter Achterberg)探讨了风险社会与生态民主问题,提出自由民主政治不一定适合风险社会,协商民主政治才是风险社会的适宜模式;莫里·科恩(Maurie J. Cohen)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试图找出适合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如莱恩·威尔金森(Lain Wilkinson)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与忧虑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马克·海恩斯·丹尼尔(Mark Haynes Daniell)为了脆弱的下一代,提出了逃避风险的新全球战略等。有研究者认为,风险语义正逐渐覆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sup>①</sup>。

在新闻传播领域,“9·11”以后,西方学者出版了《危机传播:9·11的经验》和《有效的危机传播》等对危机传播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新闻从业人员则出版了《危机中的广播电视报道》等报道指南类图书,指导记者如何做好危机报道的心理、后勤等准备,与政府、听众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03年的“非典”爆发,此后管理学者和新闻传播

<sup>①</sup> 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53页。



学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相关话题进行研究。其中对危机传播和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侧重于对政府的信息管理和媒体应对以及媒体的突发事件报道方面。

就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而言,以“突发事件报道”、“灾难报道”、“灾害报道”、“危机报道”等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在2008年后迅速增加,以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论文为例,2003—2007年间,以上述四词为标题关键词可分别搜索论文91篇、39篇、17篇和30篇,2008—2010年间则为206篇、134篇、47篇和73篇,标题中未出现以上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更多。

当前对突发事件、灾害事件、灾难事件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报道观念和模式研究,如孙发友的《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sup>①</sup>、王润泽的《探寻灾害报道的模式突破》<sup>②</sup>等;报道方法研究,如沈正赋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sup>③</sup>;报道中的新闻伦理研究,如赵志立《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冲突》<sup>④</sup>;中外报道比较研究,如熊纬的《西方突发事件报道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sup>⑤</sup>以及其他相关议题。

总体来讲,对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偏重新闻传播的操作性,呈现出几“多”几“少”:

对自然灾害报道的研究多(尤其是地震报道),对其他突发事件的研究少。

对纸质媒体的研究多,对广播电视的研究少(广播研究更少)。其中关于广播媒体应对危机或突发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广播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优势和作用的研究;关于如何完善广播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机制、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研究;专业广播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案例的研究等。

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对具体事件的报道技巧、舆论引导的研究多,对危机预警、应急机制的研究少。已出版的著作多偏重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发展历程、媒体危机报道的原则和技巧等,对媒体预警和应急机制较少涉及,仅《政府媒体公众: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应急机制研究》(杨魁、刘晓程)一书对媒体信息传播应急机制进行了专门章节的论述,但篇幅较少,不够详细。

<sup>①</sup> 刊载于《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sup>②</sup> 刊载于《中国记者》2006年第9期。

<sup>③</sup> 刊载于《新闻大学》2002年第2期。

<sup>④</sup> 刊载于《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

<sup>⑤</sup> 刊载于《新闻知识》2009年第1期。



论文数量多,专著数量少。将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结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赵士林)、《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阈》(田中初)、《媒体危机报道:原理与策略》(王朋进、颜彦、高士屹)、《危机传播概论》(赵志立)、《突发事件与对外报道》(贺文发)、《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沈正赋)、《突发事件报道》(谢耘耕、曹慎慎、王婷)等。

我们认为,对广播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不能完全放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之下,而应当拓展到多学科综合的背景中,从新闻传播学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的有关理论,对媒体危机传播和应急报道体系,尤其是广播媒体的应急体系及信息传播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突发事件媒体传播及其应急体系,使广播电视媒体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引言 /1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 /1**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1

一、风险社会关键词 /2

二、社会转型期的公共风险 /8

三、媒介化社会的媒介化风险 /12

四、风险社会的危机传播 /15

第二节 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与公众 /18

一、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传播 /20

二、公共危机中的媒体传播 /23

三、公共危机中的公众 /26

**第二章 公共危机中的广播 /28**

第一节 灾害报道中广播的功能和作用 /28

一、信息传播 /29

二、舆论引导 /30

三、宣泄疏导 /31

四、社会整合 /33



第二节 近年广播灾害报道的突破 /34

- 一、第一时间公开报道,掌握话语主动权,引导舆论先机 /37
- 二、及时调整节目和广告,全方位服务救灾 /39
- 三、发挥媒体贴身传播优势,服务受灾群众 /41
- 四、利用声音传播优势,发挥情感抚慰功能 /42
- 五、利用无线电传播优势,服务灾害救助 /44

第三节 灾害报道中各级电台的视角差异 /45

- 一、国家媒体:关注全局、权威报道 /46
- 二、省级媒体:中观切入、夹缝生存 /47
- 三、市级媒体:偏重本土、服务性强 /48

第四节 当前广播灾害应急报道的不足 /49

- 一、应急机制欠缺难以及时应对 /50
- 二、有效覆盖不足,缺乏专业危机频率 /50
- 三、基层广播建设落后影响信息接收 /51
- 四、媒体资源开发不足、联动有待加强 /52
- 五、报道专业性不足、采访伦理失范 /53

**第三章 广播危机应对体系 /55**

第一节 建立紧急广播系统 /55

- 一、紧急广播及其作用 /55
- 二、世界著名紧急广播 /56
- 三、我国紧急广播的建立 /60

第二节 编制应急预案 /64

- 一、现行预案存在的问题 /64
- 二、完善应急预案的建议 /70



### 第三节 完善广播应急机制 /71

- 一、建立应急机制的意义 /72
- 二、广播应急机制的原则 /74
- 三、广播应急机制的构成 /74

### 第四节 呈现优化听觉文本 /84

- 一、广播文本构建 /84
- 二、广播文本优化 /89
- 三、凸现人文关怀 /98

### 第五节 跨地域、跨媒体合作 /103

- 一、打破地域界限联动传播 /103
- 二、媒体联动增强报道力度 /105
- 三、台网一体实现立体化传播 /107
- 四、发挥手机媒体的互动优势 /110

### 第六节 提升报道者的素质 /111

- 一、灾难报道者的职业素养 /111
- 二、提升报道者的职业素养 /115

### 第七节 加强防灾、预警报道 /119

- 一、防灾、救灾报道相结合 /119
- 二、加强预警报道 /121
- 三、提升公众危机意识 /124

## 第四章 危机应对的他山之石 /127

### 第一节 日本 /127

- 一、政府主导信息传播 /128
- 二、媒体积极应对灾害 /133
- 三、民众具有防灾意识 /138



## 4 广播报道与危机应对

### 第二节 美国 /139

- 一、政府不断完善综合性危机管理体系 /139
- 二、媒体积极主动报道公共危机 /144

### 第三节 英国 /146

- 一、政府的整合危机管理 /146
- 二、危机中政府与媒体协作 /147
- 三、强化对公众的危机教育 /149

### 附录 /151

- 附录一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 /151
- 附录二 美国达特中心记者培训材料两则 /159

### 参考文献 /178

### 后记 /184



#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媒体传播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1984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德文版的著作《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n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以区别于“现代社会”。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佐证,此后越来越多的风险就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人们。十年后,英国“疯牛病”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使风险社会理论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尤其是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风险社会理论成为西方最热门的理论之一。学者们对当今社会这一整体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揭示与把握,使风险话语不但获得了令人尊重的科学理性地位,而且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公共事务的进程,凸显出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西方研究者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自反性和公共性的特点,且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使得当今社会的风险表现得更为复杂。<sup>①</sup>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

---

<sup>①</sup> 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因此,他在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时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发展逻辑与现代性的后果不仅带来诸多人为危难与社会不平等,更同时衍生了大量难以预测却影响深远的未知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结构与动力。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尽管风险古已有之,但风险社会的“风险景象”与传统工业社会迥然不同:高强度意义上的风险打破了风险的分配逻辑,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避免。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风险同样是全球化的。

## 一、风险社会关键词

风险、危机、灾难是全球化时代三个相互关联且使用频度较高的词语,频繁地出现在各类著作、媒体报道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中。(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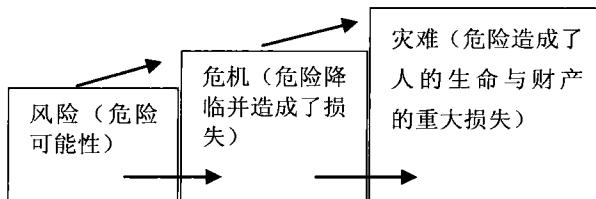


图 1—1 风险、危机和灾难的危害的程度比较<sup>①</sup>

### (一) 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并非一个新鲜话题。贝克、吉登斯等认为,人类对风

<sup>①</sup> 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页。



险的评估始于大航海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扩张,风险的评估与保险业务的发展更加趋于成熟。六世纪,热那亚人在海上贸易中便有了对于风险管理。从词源上考察,“风险”(risk)源于拉丁文 *Risicare* 一词,与希腊语“山崖”(Cliff)相关,其词义为“在山崖中航行”,故“风险”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有危险的可能”,或者说是“有遭受损失、不利、伤害乃至毁灭的可能性”。在英文中,“风险”一词开始时较多地用于海上探险中,特指航海时会有触礁等危险的可能性。后来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人们用此词来指商业活动与金融投资中“预料中的意外损失”的可能性。随后,该词被广泛引申并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鉴于人们对自然灾害、战争灾难、恐怖主义、生态恶化的深刻体验,“风险”已成为当今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并与危机和灾难关联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sup>①</sup>他将“风险”视作与“自然”和“传统”概念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也表明现代社会的风险已经不再仅指传统社会人们所认可的自然灾害、传统威胁。

贝克“风险社会”的概念用来表征当今世界正在从传统工业社会形态向一种后工业社会形态——风险社会——的转变进程。<sup>②</sup> 并对风险概念作了如下总结<sup>③</sup>:

- (1) 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
- (2) 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 (3) 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
- (4) 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
- (5) 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体会到的知识与无知;

<sup>①</sup>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sup>②</sup>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③</sup>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 Joost Van Loon (ed.),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p. 211—229.



- (6) 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
- (7) 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
- (8) 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吉登斯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制造的风险。前者是指来自于外部的、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地震、洪水等;后者是指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风险,如核泄漏、全球变暖等。<sup>①</sup>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指人为制造的风险。

## (二) 危机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由于环境自身的不确定性、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与危机相伴随。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回应各种危机的挑战的过程。

和“风险”一样,“危机”的概念也总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危机”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晋书·诸葛长民传》,其中有“贵必履危机”之句;“危机”也被称为“灾”或“祸”,如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汉语中,“危机”一词由“危”和“机”两个字组成,表明一种危难的紧急和紧迫态势,是紧急状态的简称。查尔斯·赫尔曼(Hermann)认为英文的“危机”(crisis)源于希腊语的分离(krinein),其原意是人得病后要面临恢复或死亡的巨变,后来引申的含义有危险(risk)、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危害(hazard)、灾难(catastrophe)等,通常指一种不可预期的危难状态。

尽管危机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危机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开始萌芽,其发端可以说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任院长格雷厄姆·艾理森(G. Allison)据此写出的《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一书,被学者徐立德认为是“一本危机管理的经典之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三哩岛电厂核泄漏事件、强生泰诺林胶囊中毒事件等危机事件频繁发生时,危机管理才逐渐受到重视。

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侧面给出了不同的危机定义。危机研究的先驱查尔

<sup>①</sup>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Routledge Press, 2000, pp. 25—35, p. 29.